

多景楼与两宋文学

李德辉

楼阁历来是人们的登览之地，也是文人赋咏的对象。唐宋时期，地方官主修的楼阁成批涌现，楼阁文化发展到相当的高度，而文学也在不断地高涨，二者的发展基本同步。但是不同的楼阁和文学的关联度却很不一样，楼阁所处的地理位置、历史背景不同，其文学意义也不一样。举例来说，内地的楼阁和边境的楼阁，风景型的楼阁和历史—文化型的楼阁，就存在这样的差异。江苏镇江的多景楼就是这样一座很特别的楼阁，它北宋时还深居内地，到了南宋却变为边楼；楼的本身既景色秀丽，和宋代历史、文学的关系也颇为紧密，在众多的宋代楼阁中较有代表性，本文选择这座名楼，探索其文学意义。

—

多景楼是一座宋代名楼，在宋镇江府丹徒县北固山顶。楼名取自李德裕《晚下北固山喜径松成阴怅然怀古偶题临江亭》诗“多景悬窗牖”，意谓临窗远眺，山川胜景有如悬挂在窗户上。楼约修成于神宗熙宁以前。熙宁七年苏轼自杭过润，与孙洙、王存会于此，以楼前景色为题赋《采桑子》词，此时即已有楼了。楼的前身是唐代北固山的临江亭，楼就建在这座唐代江亭的故基上。唐人储光羲《临江亭五咏》其一最早对这个亭子的地理形势作了形象描绘，云：“晋家南作帝，京镇北为关。江水中分地，城楼下带山。”说明这个亭子的兴修，和山河的形胜、都城的南迁都有关。刘禹锡《和浙西李大夫晚下北固山》则云：“晋宋齐梁都，千山万江口。烟散隋宫出，涛来海门吼。风俗太伯余，衣冠永嘉后。江长天作限，山固壤无朽。”不但言地理形势，还记风俗人情，写得更好。这些唐人的题咏也提升了此楼的文化品位，扩大了它的社会影响。

但此楼在靖康之乱中被焚。乾道六年才由郡守陈天麟重建，为屋五楹。淳熙中，郡守耿秉又加重修，总领吴玕书匾，并作诗纪曰：“几年殊草创，今日见天成。”（《嘉

定镇江志》卷一二）这个新楼，亦得江山之胜，陆游《入蜀记》称其“下临大江，淮南草木可数。登览之胜，实过于旧”。刘过《多景楼》亦云：“金焦两山相对起，不尽中流大江水。一楼坐断天中央，收拾淮南数千里。”两人诗文，恰好可以互注。

宋元以来，这座楼阁因为“面山背江，为天下甲观”（《嘉定镇江志》卷八），常有文人登临赋咏。仅《全宋诗》和《全宋词》所收即达四十三人、五十五首，这还只是当时的一部分。题咏之作如此集中，不仅是因为风景秀丽，更是因为形势险要，地位突出。东晋南朝，这里因为有长江天堑以限南北，有相对稳固的战略后方，能够形成进可攻、退可守的态势，故成为南北纷争的核心地带。在宋朝，镇江因为当吴越之门户，为江南之屏障，又因有运河相通，控扼长江，为国家经济命脉所系，其重要性又过于前。楼的下面是辽阔的淮南大地，视野再移往西北，则似乎广袤的青徐兖豫都在望中。而这些地方又都是汉唐的旧境、北宋的故土，站在这里能够眺望和遥想到这些地方，这座楼阁就具有了镜子般的认识意义，从中可看出很多的东西，例如夷夏之防、南北之争，治乱的循环、政权的更迭、兴亡的悲喜……在南宋敌强我弱的形势下，登楼的宋人就经常产生这类联想；其所创作的登临诗词，也多有这类新内涵。这些都是南宋特殊的时代背景加载给它的，是这种时局所催生的新增量。这些东西也使得这座楼阁去现实更远，而离历史更近。也许正是由于上述因素的作用，多景楼登临诗词才成为两宋文学中内涵较为丰厚的一类，人们不仅从中可以看出这座楼阁的特殊文化意义，借此还可看到整个建筑在南北纷争地带之楼阁群落的特殊蕴涵，不仅能认识到“风景”对于楼阁的重要意义，还能认识到“背景”对于楼阁增值的关键作用。因为，如果多景楼不是建筑在这样一个政治、军事上的敏感地带，那它就不具有这些意义，其文学性也将大大减弱。

所以，我们研究宋代文学，不仅要注意到夷与夏，更当注意到南与北。不仅要树立种族与统系的意识，还应当具有地域的眼光，特别是对南宋文学，尤当充分注意到其在地域上、历史上的特殊性。不仅要注意到中原与江左，更当注意到联系中原和江左的纽带与桥梁；不仅要注意到宋室的南迁，更当注意到都城南迁所引起的城市布局、交通网络的变化及文人移动方向的变化。因为经验证明，往往是那些交通上的枢纽带和不同文化区域的结合部，能够关系到全局，较有研究意义。镇江、扬州，就是这样的结合部，它们都处在南北中国的中轴线上，承载了上述内容，具有“镜子”般的认识意义。

而同样是在南北中国的结合部，为什么宋人偏偏多关注镇江一带的楼观，如多景楼、北固楼、甘露寺，而却冷落了汝南、寿阳、新蔡等沿淮重镇呢？要知道，这些地方，在六朝南北纷争之际，可一直都是双方必争的政治军事重地呀！究其原因，还在于这些楼观在宋世都地当运河水路，由此可东通吴越，西联京洛，南接江湖，北达扬究，不仅交通特别便利，文化内涵也特别丰厚。其所在地镇江，六朝以来桑梓帝宅，为一方都会。唐五代北宋常为重镇，六代风流、唐风宋韵，综萃于斯。所以南宋文人一到这里，就很自然地想到故都，想到中原，想到恢复，他们的这类创作，因此不仅在地域上关系到南与北，政治上、文化上也牵涉到华与戎、敌与我，自然受到更多的注意。而汝南、寿阳、新蔡等地则不然，它们虽然也在宋金的交界处，但是在宋代已经不再是当路的州郡，多数宋人南迁北返都不经过这里，自然不能引起人们的注意。

而从军事地理上看，镇江一地不仅是胡族南侵必经之通道，也是江左政权北进之据地。东晋时，祖逖就是从这里渡江北伐，誓清中原的。刘裕北伐，又取道于此。可见这里不仅有军事斗争的悠久历史，还有扫平中原、反击强敌的爱国传统。北宋沦亡，金兵南进，镇江又变为对敌斗争的前哨阵地。在失却了大片国土又无力收复的情况下，广大的南宋士人特别需要一个可以引领和遥望神州大地的驻足点，这时，镇江北固山上的几座楼阁，就因为有这样的天然地利，能够满足宋人的这类愿望，而变成一个遥想中原、瞻望故都的视点。他们在这里带着复杂而痛苦的感情，回溯历史，审视现状。辛弃疾《南乡子》词“何处望神州？满眼风光北固楼。千古兴亡多少事，悠悠，不尽长江滚滚流”已尽道出个中信息，登斯楼而见逝水东流、兴亡在目，可以想见其强大的触景生情功能。诸如此类的

登临之作，其叙述结构多为对景生情，由情入理，所赋既具历史感，又有现实性。一时士人登临此楼，尽皆引领北望，而不是回首南向，这是南宋多景楼诗词又一个很特别的地方，是非常耐人寻味的。

而别的楼阁却不尽如此。池州九峰楼、宣州叠嶂楼、湖州销暑楼，同为江南名楼，但都只以风景秀丽著称，都只可谓风景型楼阁，都只有“景观”的意义，而乏“镜子”的意义。它们主要是靠着唐代名人的题咏而知名。离开了唐人的诗章，就很难说了。诗歌写作的年代，多在四海为家的大一统时期，时代气候不同，人们自然看不到宋人诗文里面的那些东西。而在国势衰微的南宋，人们看到的却尽是些不如人意的东西，想到的多是历史的往迹，痛惜的多是失去了却又曾经拥有过的东西，作品里充满了怀旧的情调。如僧仲殊诗：“六朝都在望，回首倦登楼”、“一昨丹阳王气销，尽将豪侈谢尘嚣。衣冠不复宗唐代，父老犹能道晋朝”（《方輶胜览》卷三），所赋都有一种悠远的时空感，而意绪也分外地惆怅，读之令人悲感。南宋周孚的《多景楼诗》也表达了这种情感。诗云：“往时百仞山，丹阳丽朝日。江天富佳致，收揽不遗一。匆匆熙丰事，电往那可诘。故基谁为徙，胜概从此失。如窥一面网，反堕三凌室。幽怀郁尘雾，老眼暗髹漆。”将新旧两座多景楼对比，而以南北宋不同的时代背景作衬托，诗中充满对北宋时事的追忆，“熙丰”在他看来，是两个人心思治、奋发有为的时代，现在置身危乱的时局，再来回想这些，令人难以为怀，因有此叹。

这时候，像多景楼这类楼阁的意义就突显出来了，注意到它的人也多起来。其他地区的楼阁则深居内地，不在接敌的前线，自不具有这样的意义。比如岳州岳阳楼，尽管在唐和北宋声名显赫，但进入南宋以后则渐渐不闻，除了偶尔有一二迁客骚人经过赋诗感怀以外，就难见别的作品了，题材和风格都变得单调少变，这样的沉寂局面一直保持到清及近代，这是很能说明问题的。

二

话说回来，即景仍然是宋人多景楼诗词的重要内容。多景楼所处之地本来就气象雄伟，北固山又为京口之最胜，而南宋的多景楼“又为北固胜处”。而且它并不是一座孤立的楼阁，而是整个北固山庞大建筑群体的一部分。据宋人方志记载，当时这一带共有“五城十二楼”，其中有名字见载的就有雨华、清晖、凝虚、多景等四座。多景楼修成之初，即被宋人赞为“天下之殊景”（《嘉定镇

江志》卷一二)。仁宗朝,裴煜来守润州,作《多景楼》诗,亦云:“登临每忆卫公诗,多景惟于此处宜。海岸千艘浮若芥,邦人万室布如旗。江山气象回环见,宇宙端倪指点知。禅老莫辞勤候迓,使君官满有归期。”收录在《舆地纪胜》卷七的五十五例宋人诗,十之八九是这类景句,作者多为北宋人,思想内容相对单纯,不过景致清幽、心情愉快而已。写得好的诗如米芾《题多景楼吴太守裴如晦学士》:“六代萧萧木叶稀,楼高北固落残晖。两州城郭青烟起,千里江山白鹭飞。”诗笔清壮,文思飘逸。又如曾巩《甘露寺多景楼》:“欲收嘉景此楼中,徙倚阑干四望通。云乱水光浮紫翠,天含山气入青红。一川钟呗淮南月,万里帆樯海外风。老去衣衿尘土在,只将心目羡冥鸿。”景象壮丽,开人心目。

然而类似诗句唐人也写过,而且质量较高,不乏名联。面对这种局面,宋人再写似乎难以为继,但是他们制作的诗章却偏偏能自出新意。如同是写江面景色,唐人王湾《次北固山下》是“潮平两岸阔,风正一帆悬”,写白昼江行,至于宋人王安国,则曰“半夜楼台浮海口,万家箫鼓递江风”,转写夜晚江景,内容也由自然景观转到社会面貌。同是写镇江对岸的扬州,唐人张子容诗曰“徐州带绿水,楚国在青霄。张幕连江树,开筵接海潮”,眼界很大,并不单写扬州,宋人杨蟠诗则云“天远楼台横北固,夜深灯火见扬州。回船却望金陵月,独倚牙旗坐浪头”,景色奇丽,唐人所无。类似诗什,莫不构思新颖,句意炼饰。可见即使是同一对象、同一主题,宋人诗也成功地避免了对唐人的重复,能在唐诗之外另辟新境。唐人所写都很正大,宋人所赋则力拓余地,务为新巧,在题材、写法和风格上都带上了新时代文学的新特点。

三

宋室南渡之后,宋金划淮而治,多景楼所处的镇江一带也由后方变成了前线、宋金对峙的主战场,这里形势的每一变化,都会触动士人脆弱而敏感的神经。这时,这里的山川形胜就开始从反面不断地刺激士人,使得他们不停地慨叹国耻国难,悲壮之气,笼罩了整个南宋乃至元初近二百年的多景楼诗词,其内容一言以蔽之,谓之“危乱讽”可也。然而乱世之音也罢,亡国之音也罢,无论音调如何哀厉,文情如何慷慨,吟唱的却都是南宋文学的审美主调,体现的都是当时文学的本色。南宋士人登临此楼,面对国破家亡的现实,心情往往痛苦而矛盾,其所创作的多景楼诗词,情思也特别复杂。为多景

楼壮丽的山河形势所激发,士人登高北望,会激起一种“焚龙庭、空漠北”的壮心。其时尽管中原沦陷已数十年,然而忠义之士仍思奋发,为国雪耻,而不甘心于恃江为固。多景楼的主修者陈天麟撰写的《多景楼记》即抒发了这种情感,云:“东瞰海门,西望浮玉,江流紫带,海潮腾迅,而惟扬城牒、浮图,陈于几席之外;断山零落,出没于烟云杳霭之间。至天清日明,一目万里,神州赤县,未归舆地,使人慨然有恢复意。”不仅此文,多数南宋人的登临诗词,都是因此而起。杨炎正《水调歌头·登多景楼》、陆游《水调歌头·多景楼》及韩元吉的同题和作均为代表,三篇词作都气象肃杀,画面动荡,包蕴深广,悲中见壮,表现出南宋中期文学的时代特征。

南宋后期,宋朝面临蒙元的威胁,再无复国的希望。与此相应,这一时期的多景楼诗词,也有一种特别的惨痛感,景物的描写则退到次要的地位。如王琮《题多景楼》:“秋满阑干晚共凭,残烟衰草最关情。西风吹起江心浪,犹作当时击楫声。”以凄景写壮心,兼具伤时忧国意味。首联谓秋色满阑,残烟衰草,尾联写江风凛冽,浪涛翻滚,宛如祖逖中流击楫之声,见之涌起壮怀。镇江本为祖逖击楫之所,王琮产生这样的联想,自是情理中事。

宋末元初的多景楼诗词,则又变为易代孤臣的哀厉之音。面对国家破灭的惨剧,他们创作的登临诗词,普遍地悲情笼罩。作者如卫宗武、林景熙、汪元量等,多是宋朝遗民,其登临诗词表达的,是对故国的怀想、对历史的感叹,有一种特别的沧桑,但抒情却很含蓄,很藏抑,这是一种格调。而那些性情豪逸者所作,则仍蕴藏一股英气。如刘过《题京口多景楼》“壮观东南二百州,景于多处最多愁”云云,风格奇伟,声调悲壮,这又是一种格调。

依理说,多景楼诗词基于镇江地域风土,应属一种地域文学。但由于这里在南宋区域地理位置上的中心化,其文学也被中心化。靖康之难虽使宋人失去了都城汴京,但宋室南迁,新的都城临安又在镇江的直南,无论宋人北伐还是北使,都得路过这里,这里成了广受瞩目的中心。在这种情况下,诗人如果要创作,其关注的眼光和表现的重点就会发生偏移,其地域性就会被部分地遮蔽或忽略,而其历史文化的内涵则有可能得到强调和突出。而从文学上看,却正是这种创作上的偏向增加了多景楼文学的蕴涵,使它较之一般的登临之作要动人;又因为这种文学喊出了人民的心声,从而更加接近当时的主流文学。这也可见越是交通便利之区,其地域性越是模糊和淡化,越有条件被

中心化，越能代表文学的主流和发展的走向。

四

总结全文，宋人的多景楼诗词作为一类有特色的题材，为我们观察宋代文学提供了一个视点。它包蕴的深广、风格的多样，固然体现出宋代文学特有的丰富与深永，而其中的写景抒情、使事用典、言语议论，尤能体现宋人的精神气度。多景楼作为一个古建筑，就像一面高悬在镇江江面上的巨镜，照临着楼下的行人和那个苦难的时代，镜面中清楚地叠映出时代的风云变幻，折射出当时文人审美心理的裂变。抛开这些不说，单纯作为地域文学作品，它们也很好地宣传了镇江，宣传了多景楼，体现了“文因楼生，楼以文传”这一古建筑与文学的辩证关系。

也许正是这些体现了它和两宋文学的关系，体现了此楼的文学价值。

时移世易。宋亡以后，元、明、清虽然仍有不少的同类诗词，但类似宋代那样的政治、军事形势已不复存在，都城的北迁，也使得镇江失去了入京要路的天然便利，因此也就不可能再现宋世的文学风貌。在失去了这一优势之后，多景楼就沦为一个普通的景点，多景楼诗词也重新回到登临览胜的庸常格局，充斥其中的，常常只是自然风光的描写，而无法吸引读者。两相对比，更加突显出宋人此类创作的独特意义。今天，历史的烽烟已经散尽，宋人留下的作品却依然是那样的发人深省。

[作者单位：湖南科技大学中国古代文学与社会文化研究基地]

• 札记 •

《元大德七年云谦刻本〈校正刘向说苑〉考略》补正

《文学遗产》2009年第5期刊有程翔先生《元大德七年云谦刻本〈校正刘向说苑〉考略》（以下简称“程文”），指出元大德本《校正刘向说苑》“与黄丕烈藏‘校正说苑’本实为同一版本”，并认为“黄丕烈所说的‘北宋本’很可能就是北大残本”，程文所附版本传承表又记“海源阁藏本（下落不明）”、“北大残本（黄丕烈本？）”云云。拜读过，颇觉有补正的必要。

程文提到的“黄丕烈藏‘校正说苑’”、“黄丕烈所说的‘北宋本’”实际上就是所谓“下落不明”的海源阁旧藏本。此本共二十卷，卷端题“校正刘向说苑卷第几”，半叶十一行，行二十字，白口，左右双边，钤有“士礼居”、“丕烈”、“尧夫”等印鉴（王雨《王子霖古籍版本学文集》第3册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，第138页），卷六末附黄丕烈题跋三则（王绍曾等《订补海源阁书目五种》，齐鲁书社2002年版，第158—160页）。此本历经黄丕烈士礼居、汪士钟艺芸书舍、杨氏海源阁递藏。后为海源阁主人杨敬夫于1928年连同其他五种宋本，一起变卖给大连的日本满铁图书馆。1945年，这六种宋本又被苏联红军当作战利品运往莫斯科国立列宁图书馆（现名“俄罗斯国家图书馆”），至今俄国方面仍秘不示人。

既明此宋本的基本情况，则可知程文所推测的“云谦借机将书名改成了‘校正刘向说苑’”可谓无据。海源阁旧藏宋本卷端已题“校正刘向说苑”，并非元人覆刻所改。其实程文已经指出，元大德本“对原书刻工的名字也予以保留，陈元、林庸等宋代刻工姓名赫然在册”，足见元大德本对宋本进行了忠实的覆刻。版心的刻工名尚且照式录之，卷端的书名反而改动，未免有悖常理。

十一行本系统的《说苑》宋刊本，程翔先生亲见两种（北大藏残本、上图藏残本），实属难能可贵。但程文认为北大藏残本与黄丕烈旧藏本“当是同一版本”，值得商榷。北大藏残本现存十卷（卷一至卷二〇），卷端题“说苑卷第几”（李盛铎《木犀轩藏书题记及书录》，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，第155页），与黄丕烈旧藏本卷端所题“校正刘向说苑卷第几”明显有别，二本并非同版。傅增湘早已指出此二本在字形方面存在区别：“余详绎此本（按：即北大藏残本），虽字体方正，行款与海源阁藏宋本合，然气息孱薄。”（傅增湘《藏园群书经眼录》，中华书局1983年版，第542—543页）虽然只是对版本“观风望气”，不够详尽具体，但由于傅增湘是为数不多的亲眼见过海源阁藏宋本《说苑》的专家，他的鉴定意见至今仍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。

王绍曾先生生前呼吁：“现在世界各国都在清理战时被掠夺的图书文物，我希望海源阁遗书六种，有一天能重归故土。”（王绍曾《从海源阁书目整理谈到海源阁藏书聚散》，《藏书家》第1辑，齐鲁书社1999年版，第137页）这无疑是我们共同的期待。如果流失海外的《说苑》宋本能够早日面世，必将极大地推动对包括此版本在内的《说苑》十一行本系统展开全面、深入的研究。

（秦桦林）